

在被围困处追问：程皎旻小说中的女性悬疑书写

常晔德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7月31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5日

摘要

“女性悬疑”是近年来女性写作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指涉的是一种取材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以悬疑叙事为形式的文学表达。在程皎旻笔下，悬疑的重心并非外部谜案的侦破，而在于女性在职场、婚恋与成长中被围困的生命经验；悬疑的线索也并非类型小说的逻辑推演，而是对女性与其所处关系网络的层层剥解；在叙事策略上，程皎旻通过烘托女性人物的主体性、穿插流动的异乡空间经验，并借助限制性视角的认知囿限，营造出层层递进的悬疑张力。由此，程皎旻的“女性悬疑”书写超越了类型小说的娱乐叙事，成为一种以悬疑为方法的社会诊断。

关键词

程皎旻，都市女性，悬疑叙事

Interrogating from within Enclosure: Female Suspense Writing in Cheng Jiaoyang's Fiction

Weide Ch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ly 31, 2026; accepted: October 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Female suspense” is a noteworthy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 referring to a literary expression that draws on women’s everyday life experiences and employs suspense narrative as its formal vehicle. In Cheng Jiaoyang’s works, the core of suspense lies no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external crimes, but in the enclosed life experiences of women across the domains of career,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personal growth. The thread of suspense does not unfold through the logical deduction typical of genre fiction, but rather through the gradual disentanglement of women from their surrounding 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 In terms of narrative strategy, Cheng Jiaoyang constructs layers of suspenseful tension by foregrounding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her female characters, interspersing experiences of displacement in foreign cities, and exploiting the cognitive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restricted points of view. In this way, Cheng Jiaoyang's "female suspense" writing transcends the entertainment-oriented narrative of genre fiction, becoming a form of social diagnosis that employs suspense as its method.

Keywords

Cheng Jiaoyang, Urban Women, Suspense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当代文学版图中，城市叙事与女性经验的结合已非新鲜命题。然而，青年作家程皎旻却以对悬疑叙事形式的自觉运用，为这一命题注入了新的质素。十余年“港漂”的经历，使她与笔下那些在都市中漂泊求存的女性人物，共享着生命经验上的亲缘性。但她并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地再现现实，而是以悬疑作为一种叙事方法，深入都市女性的生存处境。

学界对悬疑小说的界定，通常强调其“以悬而未决、曲折的情节推进故事发展”的类型特征([1]: p. 138)。以此为基点加以延伸，“女性悬疑”书写则可被视为一种取材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以悬疑叙事为形式的文学表达。从早期作品《破茧》初见端倪，到《狗人》《我能再遇见你一面吗》中隐约浮现的悬疑笔触，再到新作《节果决明》里技法运用的日臻圆熟，程皎旻在悬疑的迷障中抽丝剥茧，一步步深入都市女性的生存腹地。基于此，本文拟从悬疑叙事的重心何在、女性关系作为悬疑推演的线索，以及叙事技巧如何参与悬疑布局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以期对程皎旻创作中这一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面向加以考察。

2. 悬疑的重心：被围困的女性经验

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为悬疑小说的生长提供了丰沃土壤，悬疑小说创作始终保持着活跃态势。上官午夜、丁墨、尾鱼、鬼马星、赛西娅等女性写手在这一领域的创作实践，显示出某种共同取向。她们拒绝将悬疑叙事架空于现实之上，而是沉降于女性的日常经验之中，从婚恋、职场、家庭等场域中汲取叙事素材，析出悬疑元素，进而转化为案件的核心设定。上官午夜《天劫》以古小烟随父母迁居城市的经历，展现了乡村女孩面对都市化洗礼时无所适从的成长阵痛；丁墨《他来了，请闭眼》中王婉薇一案，以伪装成自杀的谋杀揭露职场中女性被遮蔽的隐形压迫；鬼马星的《爱欲八鲜汤》，以连环凶案勾连社团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与欲望冲突，罪孽的根源最终直指人心深处的爱欲；赛西娅则在《永不结束的夏天》中，将校园霸凌的代际传递与连环复仇的凶杀相绞结。程皎旻的悬疑创作，显露出了相似的主题关切。她将都市女性在职场竞争、两性博弈、亲情纠葛与校园成长中所承受的隐痛，作为悬疑叙事得以展开的现实支点。有所不同的是，她无意追求设疑的过分奇崛，也未曾构造血案、虐杀等极端情节，而是在对都市女性内心秘事的渐次开掘中，观照其心灵深处未能愈合的创伤。

职场经验的书写，在程皎旻的悬疑叙事中占据重要篇幅。作者本人曾供职于国际4A广告公司与金融

集团，从事策划与营销工作，对职场丛林法则有着切身体认。《狗人》中的女主人公苏叶便是这一经验的集中投射。小说始于苏叶在年会醉酒归家途中，救下一只被欺凌的丑狗。随后一只“狗人”现身，声称可以帮她咬伤一人作为报答。出于对公司消费种族议题、边缘化港漂员工，以及上司戴文骚扰实习生等行径的积愤，苏叶决定指使狗人袭击戴文。此刻，她征用了一个外在于理性秩序的暴力他者，来抗衡其所处的生存困境。悬疑在此充当了“去修辞化”的装置。当那些暧昧含混的隐形规则无法被公开指认时，小说便借一场超现实的暴力契约，逼迫其现出原形。《节果决明》中，何紫费心写就的故事大纲被公司隐瞒挪用，编剧署名遭到替换。人事部门以在职期间创作内容版权归属公司的合约条款，合法收缴了她的智力成果。何紫所受的侵害，在法律层面沦为了不可识别、不可申告的存在。于是，悬疑从“凶手是谁”转向“为何没有凶手”的追问。当侵害被制度合法化、分散化与隐蔽化之后，追责本身成为不可能。女性既无法在既有规则内获胜，也无法在规则外获得清白。当悬疑书写普遍将法律视为正义的审判者时，程皎旸却将法律的盲视写入叙事，以此审视制度工具如何因运作的漏洞而沦为剥削的同谋。

婚恋经验触及女性最为私密的情感地带。《我能再见到你一面吗》中，女主人公阿芋在城市立足之后，因不满男友何森的经济窘迫而与之分手。为化解心中的愧疚，阿芋试图借助都市商业逻辑寻求清算的可能。于是，她来到“完美恋人演绎馆”，以一千港币的酬劳委托专业演员扮演何森，完成一场仪式性告别。当情感债务被转译为可购买的服务，告别便不再是对过往的郑重了结，而沦为消费系统对情感剩余价值的最后一次榨取。意外的是，服务因演员病倒而取消，阿芋却在街头与焕然一新的何森不期而遇。她忽然觉得，刚刚遇见的，恐怕真的是何森，一个对过去释怀，对她再无爱也恨，甚至一丁点责怪、怀念也不存的何森。可这是她想要的结局吗？她忽然期盼手机能在此刻震动起来，她希望能收到完美恋人演绎馆的确认信息。那信息应该是这么写：“林小姐，您的‘偶遇’服务已完成，是不是很惊喜？”（[2]: p. 101）此刻，阿芋已无从辨认眼前之人究竟是本人还是替补演员，情感的真实与伪造之间的边界已然模糊。消费主义以“定制告别”的形式许诺一场干净利落的情感交割，却终究无法替阿芋承担那份无从安置的空虚。《没有男人的女人》中，在深爱的男友约瑟夫死后，金月在整理遗物时，无意中翻出一张约瑟夫与前任女友的亲密合影。金月的哀悼瞬间扭转成一场充满嫉妒的“窥视”。几经周折，她跟踪并拦下了女孩的弟弟麦克以求索证。然而，就在麦克即将拨通姐姐电话之际，金月却“赶紧捂住耳朵，转身，以一种逃亡的姿态与他背向而驰”。（[3]: p. 187）她恐惧事实与自我建构的回忆截然对立，恐惧沉溺的过往不过是一场虚妄，这远比失去深爱的恋人，更令存在本身感到荒芜。程皎旸借悬疑所剖示的，不是关于爱情真相的伦理裁决，而是情感本身在当代都市语境中的悬浮状态。阿芋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无可辨别的错愕，金月在真相呼之欲出时猛烈地退却，揭示了女性在情感中的共通困境：她们渴望通过外部手段来确证爱的真实性与唯一性，然而爱却无法被任何外在于主体的证据所证实。

成长经验是程皎旸创作中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乌鸦在港岛线起飞》中，背生两翼的幼女，在地铁里被父母用塑料绳紧紧捆绑，女孩最终挣脱束缚、挥翅飞起的瞬间，喻示生命对原始自由的本能渴求。

《透明女孩》中阿简的身体化为透明，是底层少女在物质窘迫与亲情勒索下，其自我价值被彻底剥夺后的生理回应。在《非她命》中，程皎旸首次将成长书写置于悬疑氛围之中。童年时期，程皎旸随父母从武汉迁居北京，“那些从六岁就开始陪伴我上课、午睡、恶作剧、抄作业、讲八卦的同班小伙伴们，一次性被清空”。（[4]: p. 60）那种因连根拔起而生的失语状态，被她形容为“一种突然之间、内心盛放的一切五光十色的喜怒哀乐，都被掏空的感觉，心里从此有一个巨大的洞，它空空如也，无法再发力释放幸福感”。（[4]: p. 60）她将自身的生命体验注入《非她命》里金紫紫这一形象。因外地借读生身份，金紫紫成为班级同学欺凌的靶心，小说以密集的细节描写铺陈了这种弥散的敌意：“只要我出现，原本正热火朝天的闲聊就会忽然静止。课间去厕所，大家会故意假装看不到我，或走得飞快，避免与我结伴而行。体育课需要二人一组做仰卧起坐，没有女生愿意和我搭档，我只能和男生在一起。逐渐地，我发现更明显的意外，

例如从课间操回来，我原本挂在椅背上的雪白外套，被扔在地上，踩出了好几个脚印。早上交上去的作业本，到了下午收到时，印着飞天小女警的可爱封面被撕掉了……” ([5]: p. 204) 面对金紫紫的苦恼求助，班主任却发出“大家为什么都讨厌你”的反向诘问。步入初中后，每一学期德育处对借读生的特殊训导，更加重了她对自身身份的警觉与不安。若出现早恋、逃学、作弊、打群架等行为，借读生一律面临开除。这种规范化安排所施加的，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惩罚威胁，更是一种内化的生存逻辑。它使金紫紫在自我压抑与假性融入之间持续摇摆，悬疑的张力正源于这种内心裂隙。恰恰是她最畏惧的“越界”，却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降临。金紫紫只因帮助传话，便不慎卷入白杨的激情杀人事件。“我想去阻止白杨，但我的双腿却好像被水泥封印在地，动不了。我想大喊救命，但脑子里却一下子浮现德育处主任的脸、我妈的脸，甚至听到警车的鸣叫。” ([5]: p. 232) 作为一旦触犯校规便被无条件开除的借读生，她既不敢声张报案，又无法向母亲坦白。至此，凶杀案的脱罪已退居次要，悬疑的真正指向，在于主人公的内心困局。金紫紫的怯懦与惊惶，正是制度将其标记为异类后，在心理层面持续弥漫的生存恐惧。作者由此批判了学校通过“规范化裁决”，依据既定标准对个体进行区分、评判与归类，所施加于个体的身份焦虑。然而，程皎旻并未让金紫紫的处境停滞于受创伤的瞬间，而是将其纳入持续的成长叙事之中。这一写法，恰恰区别于同类题材中常见的“伤痕陈列”，悬疑女作家赛西娅的《永不结束的夏天》便是一例。该小说同样触及校园霸凌主题。少女李清优出身寒微而相貌出众，因此招致同宿舍女生苏静茹等人的嫉恨，被恶意散布黄谣，遭下药后于睡梦中被抛掷于垃圾桶，后又目睹亲妹被逼迫坠楼身亡。李清优隐姓埋名渴望重启人生，然而十七年前的创伤却从未真正终结，它以幽灵般的姿态持续附着于她的生命。李清优的女儿被苏静茹之女季琳琳霸凌溺亡，复仇的序幕由此拉开。李清优策划了游乐园过山车事故，致季琳琳死亡。“与之相背，金紫紫抵御被边缘化、被欺凌的方式，并非诉诸‘血债血偿’的极端形式，而是持续摸索自保之道。” 她以痞气掩藏脆弱，以成绩积累信任，最终成为同学追随的“风云人物”。创伤并未使其颓丧，反而激发了她的韧性。与被创痛凝固的李清优相比，金紫紫是在创伤中持续成长的主体，其成长是流动的、开放的。前者以复仇闭环完成对创伤的戏剧化封存，后者则以层层蜕变的成长轨迹，呈现出女性在困境中不断生成、不断重构自身的生存可能。

求职、婚恋、成长，三重贯穿女性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在悬疑的牵引下渐次铺展。职场中法律所不及的隐形空间蛰伏着侵害，情感的真实性和商品化潮流中无可辨认，身份标签的威慑内化为自我压抑，如此种种，共同构成了女性身处的既无法言说又无从逃逸的灰色地带。程皎旻笔下，真相所通往的，正是女性心中那未曾言说的焦虑、无法确证的迷茫与无从反抗的愤怒。

3. 悬疑的线索：关系网络的编织与拆解

悬疑叙事的推进，有赖于线索的层层铺陈。悬疑的表象之下所翻涌的，正是人心深处无从安放的欲望。正如拉康所言：与其说人所欲望的是对象，不如说人所欲望的是关系，是一种与自我意识的确立不可分离的关系。因为人所欲求的并非实体性对象，而是对他者欲望的认同与模仿 ([6]: p. 171)。程皎旻笔下谜题破解的关键，也并非纯粹的逻辑推演，而在于对女性人际网络的勘探。每一次释疑，都让读者得以窥见那些围束于女性周身、细密得令人透不过气的游丝。

职场关系是权力交织最为密集的场域。《节果决明》里何紫通宵写就的故事大纲，被公司随意挪用。面对何紫的质问，老板大卫以暴力相胁，将座椅向其大力推去，何紫在躲闪中报警。到场的两位男警却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对暴力的双重消解。年轻的警察以“无肢体接触”的技术性判断，将暴力恐吓降格为民事纠纷，年长者则“一直皱眉看着她，时而冷笑，翻白眼，时而发出‘啧’一声，仿佛错的是她。” ([5]: p. 25) 父权制的运作往往隐匿于中性化的制度与常识之中。正如拉康将无意识界定为“大他者的话语”——警察的判断并非纯粹的个人偏见，而是一整套性别权力结构在具体执行层面的无意识复现。法

律执行中的形式主义与男性对女性处境的共情缺失，在此达成合谋。然而，程皎旻并未将职场权力斗争简化为两性对立的单向叙事，而是将悬疑的视域延伸至女性内部的分化与缠斗。当晋升通道与行业机会被男性所主宰，“服从”本身便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生存策略。《狗人》中苏叶将实习生卡尼卡视为亟待拯救的受辱者，借助超现实的“狗人”对实施性骚扰的上司施以惩戒。但苏叶未曾察觉，卡尼卡早已在职场丛林中习得了另一套生存法则，她甘愿忍受猥亵，将身体触碰视为升迁的捷径。“卡尼卡举起一只手，遮挡刺眼的阳光，同时也遮住了她那皱起的眉头，‘你以为我是傻子吗？让戴文摸一下，就可以多拿到一个项目，为什么你要多管闲事？’苏叶愣住了。她觉得阳光好辣，辣得她嗓子眼都疼了。”([7]: p. 212)卡尼卡对自身屈辱处境的“自觉”接纳，甚至对反抗者投以鄙夷，表明她已在无意识中成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人所欲望的对象就是大他者所欲望的对象……人是从另一个人(大他者)的角度来欲望的。”([8]: p. 144)在这里，“大他者”就是职场权力秩序的人格化化身戴文。卡尼卡献出身体，并非源于无知或被迫，而是因为她洞悉了利益交换的法则，欲望的流向即权力的指向，而她只要成为那个“被欲望的客体”，便能分得权力的剩余。卡尼卡的妥协不仅瓦解了苏叶的道德自洽，更揭示了职场中女性互助联盟的脆弱。小说由此显现出超出二元对立的深刻性，既真实捕捉了男性主导下女性所遭遇的性别权力挤压，又毫不留情地指出，女性自身也未能免于在有限资源中相互倾轧的命运，而在内部形成了关于何为“正确”的彼此指认与尖锐论争。

亲情关系，尤其是母女关系，在程皎旻笔下呈现出复杂的纠缠。乐黛云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母女关系的不平等性，缘于母亲“总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女儿，让她们安于母亲为她安排的角色，女儿只能属于母亲而不能属于‘自己’”，这种以“孝”为名的文化伦理“对于女性自我的成熟是极大的压抑”，而“神圣母亲的神话”往往是“一种维护旧秩序的退步的力量”。([9]: p. 48)《破茧》中蝴蝶与母亲的关系，正是这一症候的显影。蝴蝶的成长始终处于母亲的驱策之下，其身体被征用为阶层跃升的工具。她先后在母亲的授意下接近数名男性。二十岁那年，她听从母亲的谋划，故意熬坏身体，借求医之名引诱中年医生王生。在其与原配离婚之后，蝴蝶与王生步入了婚姻。这段基于利益置换的婚姻，日渐沦为寡欲的围城。当蝴蝶偶遇初恋阿杰，那近乎本能的旧情复燃，成为她向生活反扑的唯一出口。母亲敏锐地嗅到了失控的危险，为扼杀这一变数，她暗中包养了阿杰。阿杰的逐渐失联与母亲的频繁外出，使蝴蝶心头疑窦丛生。当她撞破两人的性事，前文所有的隐晦线索骤然收束。在这场暗流涌动的母女博弈中，蝴蝶所追逐的并非某个具体的男性对象，而是母亲欲望的投射。这正呼应了拉康所说的欲望结构。在拉康看来，“无意识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10]: p. 2)欲望“是一种社会关系座架了的非实体的欲求，它根本异质于动物性的维持生命的果腹取暖的衣食之需，它表现为对他者无意识的影响和施虐，是源于他者且趋向于他者的欲望。”([6]: p. 171)蝴蝶的“选择”始终是对母亲谋划的回应，而非自我欲求的表达。盘桓在她心中最大的悬疑，也并非奸情的事实性揭露，而在于她始终无法辨识“母爱”的真伪。她既无法预判母亲将以何种手段夺回秩序的控制权，亦无法厘清那些以爱为名的干预，究竟指向母性的底佑，还是权力意志的实现。她试图以暴食发胖、夜店狂欢的自毁，撕碎母亲以爱之名作的茧。“她挣扎地呼吸着，第一次感到，这房子里的空气如此的清新，这么多年，母亲一直以爱之名，做了一个茧，把自己紧紧裹在里面，如今，她终于靠自己的力量，将这该死的茧撕碎了。”([2]: p. 198)悬疑却在此完成了从揭露向收束的突转。王生的跪求与母亲的哭泣，迅速将这场抗争收编为新一轮的道德负罪。母亲的掌控从未真正松动，蝴蝶的反抗不过是一场无力的震荡。最亲密的联结构成了最难以出走的囚笼，母女关系的吊诡正在于此。

两性关系中无法被证实的情感追问，打开了悬疑的另一重空间。《没有男人的女人》中困扰金月的真正疑惑，是亲密关系中那个永远无法抵达的“他者”。她试图以追索“约瑟夫最爱的究竟是谁”来确证自己的情感位置，却无法接受自己对约瑟夫来说并非唯一。她宁愿在抵近真相时自我悬置，也不愿直面

爱的虚无。恰如拉康所言,“最显著的事实是,人的欲望是在他人的欲望里得到其意义。这不是因为他人控制着他想要的东西,而是因为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他人承认他”。([10]:p. 278)欲望的主体永远无法直接抵达自身的欲望真相,只能在象征秩序的镜像中捕获其幻影。其本质并非指向某个可被获取的具体对象,而是结构性的、永恒的匮乏。因为“欲望是人与匮乏的关系——匮乏使人产生欲望,人所匮乏者正是人所欲望者。”([11]:p. 197)也就是说,欲望的满足不在于“得到”,而在于维系“欲求”这一状态本身的持续运转。《莫斯科方舟》中关于爱情真实性的追问,同样被悬置为一个永无告解的谜题。阿蜜独自踏上二人曾共同憧憬的莫斯科之旅,来到一起看过的电影取景地,期望借由异乡的风景,唤醒曾在克莱因蓝沙发上共同做梦的唐烨。她反复在倒影与梦境中召唤亡者幻象,却只能眼看着唐烨的身影中如“多米诺骨牌”般破裂。每一次回望非但不能觅得确定的答案,反而更清晰地照见自己的漂泊与失落。故事尾声,阿蜜意识到,“如果离开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那么也许留下的人应该释怀”。([5]:p. 80)从“追问爱的在场”到“接受爱的缺席”,这句看似平静的自我劝慰,正是女性走出两性关系百转千回的疑局后的超脱。

程皎旸的都市女性悬疑,其最终落点并非真相的揭露,而是悬疑本身的持续敞开。女主人公往往在故事结尾仍未获得确切的答案,金月无法确认约瑟夫最爱的是谁,阿蜜无法断定唐烨的自杀是逃避还是成全,何紫无法确知徐穆那些暧昧信号的意义,而这些无法被确证的悬而未决,恰恰是都市女性生存经验最真实的形态。

4. 悬疑的策略:女性主体、流动经验与限制性视角

程皎旸悬疑叙事的布局精巧,不仅体现在题材选择与主题的捕捉,更见之于叙事策略的灵活调动。

悬疑叙事中的女性形象,究竟是随谜底的揭晓而淡出人们的脑海,还是在悬疑之外生长出独立的生命质地?这考验着作者对女性心理探掘的深度。国内知名悬疑女写手丁墨,在其长篇小说《他来了,请闭眼》中,设计了“王婉薇”一案。该案同样以跨国公司职场为叙事场域,围绕职场欺压的议题展开书写。就叙事主体性而言,丁墨笔下的王婉薇,是一具等待真相还原的“尸体”。受害者的心理活动,仅能借助其断简残篇的日记拼凑推演,痛苦书写始终缺乏自我言说的主体位置。而在《狗人》中,叙事则始终以苏叶的心理意识为中心。促使苏叶做出反抗之举的心理动因,既有对卡尼卡的共情,亦有对戴文行径的愤怒,更包含对自身被边缘化处境的不甘,这一切无一不根植于真实可感的职场生存经验。由此,女性的内在感受获得了更为完整的叙事呈现。在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与形象层次的铺陈上,程皎旸的写作显然更为深透。王婉薇身陷裴泽的情感控制,将救赎希望寄寓在与新同事麦晨的爱情想象中,而始终未能对所受侵害付与实质性反抗。这一叙事安排,暴露出文本在女性自主性想象上的匮乏,使女性人物始终囿于单薄的受害者形象。与之相反,苏叶在亲眼见证与亲身感受到秩序的不公后,鼓励卡尼卡检举恶行,借狗人之力惩罚戴文,并准备向总裁自荐接管项目,这一系列行动勾勒出一个不甘于沉默、试图以个体之力对抗不公的女性形象。而卡尼卡以迎合骚扰换取晋升机会,亦将女性形象从“施害”与“受害”的简单对立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一个更具思辨性的文学存在。

流动经验的穿插铺排,为程皎旸的作品注入一种灵动质感。与本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她特别钟爱写身在异乡的人物。“我的写作离不开‘城市’。我在很多个城市生活过,每次到了新的城市,我就开启一场新的冒险,一切都是陌生又迷人的。”([12]:p. 121)游移多地的空间切换,既拓宽了人物的活动场域,也赋予叙事更为开阔的空间层次。她常常借旅行、迁居或跨境婚姻,将主人公鹄突于一个既非出生之地,亦非久居之所的陌生地带。那里或让叙述者感到彻底的陌生,或让其始终被一种难以融入的隔阂感所裹挟。在《莫斯科方舟》中,阿蜜游走于莫斯科街头,战争阴影下士兵与家人的锥心离别,不断触发她对男友坠亡记忆的闪回。陌生的异国街景与他人的悲欢,以一种近乎强制的方式反复切入她当下的知觉——

也许她们的儿子，兄弟，或者丈夫，都被派去了前线。有的可能不会再回来……这忽然令她感到心痛。爱人发硬的身体，冰凉的停尸房，哭声如海浪般此起彼伏的葬礼，一缸七零八碎的骨块——这些画面在她脑海里如蒙太奇般播放，她强迫自己停下来([5]: p. 55)。读者在叙事的残片中拼凑起阿蜜的过去，破解埋藏在她身上的诸多秘密。她为何独自旅行？又为何在目睹异国军人的出征场景时，骤然想起已逝恋人的残尸？当下知觉与过往记忆之间的神秘呼应，使每一次回望都通向更多的未知，不断引诱读者向叙事的深处探进。《节果决明》中，何紫的漂泊伴随着职业的转换，她在多个城市辗转谋生，由编剧、金融市场主任变为作家，却始终无法安顿。每一重空间都在表面上接纳着她，却又隐秘地将其排斥在外。与此相呼应，《非她命》中金紫紫随母亲从武汉迁至北京，因为没有本地学籍，求学多年仍难以摆脱被学校老师反复提醒的“借读生”身份。她没有本地生犯错时那种记过、处分、停课的缓冲余地，任何越界行为都会导致开除。当脚下的土地缺乏“生于斯长于斯”的亲近感，人物当下的迷茫体验便与旧日记忆之间形成紧张的对话关系，空间的陌生不断召唤时间的回望，过往与眼前就在叙事中彼此缠绕。

正因叙述者对所处之地缺乏安顿生命的熟悉与从容，读者亦失去了在全知视角下，旁观其命运的泰然。转而与人物一同沉浮于悬而未决的际遇之中。《非她命》中，金雁、金紫紫、小叶三人分别以第一人称轮换叙事，每一章节皆为单一视角的有限陈述：金雁眼中的小叶是勤恳踏实的保洁员，却不知其犯罪前史与亲近背后的私心；金紫紫眼中的小叶是倾听秘密的知心姐姐，却不知其身份之伪与窃取之实；直至小叶的自述章节，前文抛设的所有疑点才逐一获得解释。《节果决明》对徐穆形象的塑造，也并未在叙事初便完全展现，而是留有层叠的遮蔽与渐次敞开的余地。读者只能随何紫的有限视角步步深入，在叙述的断层间反复质询，拼合线索，渐次勾勒出徐穆完整的形象轮廓。正是这种认知的有限性，使人物摆脱了全知叙事中一览无余的被动态势，转而成为怀揣秘密、不可穷尽的存在。读者因此得以在逼近真相的途中始终保持警觉，乐此不疲地窥探人物内心郁结的秘密。

女性主体的内在掘进，流动经验的空间展开，以及读者管中窥豹般逐层深入的阅读体验，程皎旻的悬疑叙事在三个维度上完成了对通俗悬疑写作的超越。女性形象由此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质地，悬疑也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气象，视域的收束则使人物与读者共同沉浮于未知的张力之中。三重策略的精心结构，使程皎旻的悬疑书写既保有类型文学的可读性，又兼具严肃文学的人文厚度。

5. 结语

程皎旻的悬疑叙事，其旨趣不仅在于解谜本身，更指向对当代都市女性生存状态的持续揭示。叙事借助悬疑的极端情境，以女性个体的隐秘创伤为内核，逐层剥解日常生活施加于女性的压抑根源，进而抵达了类型写作鲜少企及的深度。由此，作品所构筑的便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悬疑小说，而是反映女性都市生存境遇的社会镜像。

参考文献

- [1] 朱定全, 汤哲声: 当代中国悬疑小说论——以蔡骏、那多的悬疑小说为中心[J]. 文艺争鸣, 2014(8): 138-143.
- [2] 程皎旻. 危险动物[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21.
- [3] 程皎旻. 飞往无重岛[M]. 香港: P.PLUS LIMITED, 2025.
- [4] 程皎旻. 海市蜃花——《节果决明》创作谈[J]. 山花, 2026(4): 59-63.
- [5] 程皎旻. 节果决明[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6.
- [6] 段方乐. 拉康欲望学说的逻辑建构[J]. 理论界, 2006(6): 170-171.
- [7] 程皎旻. 打风[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5.
- [8] 马元龙. 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论拉康的无意识理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 28(5): 137-146.

- [9] 乐黛云. 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J]. 文学自由谈, 1991(3): 45-49.
- [10] 雅克·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1.
- [11] 黄汉平. 拉康的主体理论与欲望学说[J]. 文学评论, 2010(3): 194-199.
- [12] 程皎旻. 陌生又迷人的城市书写[J]. 名作欣赏, 2019(19): 121-122.